

CHINA'S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中国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

[第1卷]

改革、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REFORM,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宋立刚

主编
〔澳〕 鄂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澳〕 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

CHINA'S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中国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

[第1卷]

改革、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REFORM,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宋立刚
〔澳〕郜若素 (Ross Garnaut)
主编
蔡昉
〔澳〕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1卷, 改革、资源能源与
气候变化 / 宋立刚等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7. 6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0650 - 4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增长 -
研究 IV. ①F12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4863 号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1卷): 改革、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主 编 / 宋立刚 [澳] 鄂若素 (Ross Garnaut) 蔡 眇 [澳] 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编辑 / 陈 欣 崔红霞 周晓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8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650 - 4

定 价 / 1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本书撰稿人

(按章节写作顺序)

[澳] 鄒若素 (**Ross Garnaut**)：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负责人

[澳] 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郭震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王小鲁：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周伊晓：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科廷商学院

[澳] 伍晓鹰：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王靖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郭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美] 胡永泰 (**Wing Thye Woo**)：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马来西亚双威大学杰弗里谢东南亚研究所

孟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薛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薛进军：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中心

[美] 杜大伟 (**David Dollar**)：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茂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 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振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教授

罕丹苑妮：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现任职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投资银行部

汪仕炫：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

[澳] 伊万·罗伯茨 (Ivan Roberts)：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国际与经济研究部

[澳] 安德鲁·苏罗斯基 Andrew Zurawski：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国际与经济研究部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

罗 佳：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

陈春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李秉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刘海民：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王 灿：清华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系

郑馨竺：清华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系

[英] 凯瑟琳·白金汉 (Kathleen Buckingham)：世界资源研究所研究助理

张中祥：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英] 费格斯·格林 (Fergus Green)：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英] 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赵晓丽：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吴建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吴延瑞：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郭秀梅：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人文学院

目 录

CONTENTS

供给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澳] 鄒若素 (Ross Garnaut)
蔡 眇 宋立刚 [澳] 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 / 1

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

新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进程缓慢 [澳] 鄒若素 (Ross Garnaut)	/ 23
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成为经济增长源泉	
——一个供给侧视角 蔡 眇 郭震威 王美艳	/ 41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2020 ~ 2030 年 王小鲁 周伊晓	/ 58
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1980 ~ 2012 年 伍晓鹰	/ 78
在中国互联网能够彻底改变金融业吗？	
..... 黄益平 沈 艳 王婧一 郭 峰	/ 104
软预算约束的终结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需求侧的必要补充	
..... [美] 胡永泰 (Wing Thye Woo)	/ 126
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和收入：2008 ~ 2014 年	
..... 孟 昕 薛 森 薛进军	/ 144
全球投资者——中国 [美] 杜大伟 (David Dollar)	/ 178
先老后富：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动态转型	
..... [澳] 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 刘 行 杨茂睿 张 翔	/ 194
泡沫检验：来自上证 A 股繁荣与崩盘的证据	
..... 刘振亚 罗丹苑妮 汪仕炫	/ 223

中国公司杠杆模式变迁

——以上市公司为佐证 [澳] 伊万·罗伯茨 (Ivan Roberts)

[澳] 安德鲁·苏罗斯基 (Andrew Zurawski) / 243

资源、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

评估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对五个试点城市的实证研究

..... 胡必亮 罗 佳 陈春来 李秉勤 / 285

中国钢铁产业重整中的问题与前景 刘海民 宋立刚 / 306

基于分解分析的中国工业用水和能耗的趋势差异研究

..... 王 灿 郑馨竺 / 326

超越森林之外：来自中国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工程的经验教训

..... [英] 凯瑟琳·白金汉 (Kathleen Buckingham) / 344

助力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政策与举措 张中祥 / 362

实现经济转型与缓和气候变化：中国的战略、政策及走向

..... [英] 费格斯·格林 (Fergus Green)

[英] 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 / 384

中国电力产业绿色化问题研究 赵晓丽 / 413

中国的城市密度与碳排放 吴建新 吴延瑞 郭秀梅 / 441

供给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澳] 鄒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澳] 江诗伦 (Lauren Johnston)

引言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Song et al., 2015)一书出版后，中国经济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Garnaut and Song, 2006)预测，劳动力日益缺乏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对中国原有的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相关的竞争优势形成持续制约。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度投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以及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而产生的债务造成了投资过剩的严重后果，这就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与长期经济发展压力无关。改革期间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殊挑战（参见本书中 Johnston 等的相关文章）。国际国内的环境诉求推动中国调整经济发展的重点，并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摒弃原有的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面对过渡时期的特殊挑战，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过渡指的是中国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向新经济增长模式迈进。这体现在 2016 ~ 2020 年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在全球经济波动不定之时，中国的变革已经开始。2007 年年末全球经济陷入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

其他国家的经济则呈现各不相同的发展历程。许多国家在发达国家面临种种问题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许多主要依靠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南非、尼日利亚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从21世纪初到2011年一直受益于中国强劲的资源需求，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下进入了困难时期。近几年，世界贸易扩张速度与产出相比较慢，使中国和其他地区失去了一个经济扩张的源泉。

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储蓄都远远高于投资，因而形成了由市场配置的最低的长期利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已经试探性地停止使用历史上最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促进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仍然处于疲软状态，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可以达到的目标，这一发展趋势遍布各国。低迷的商业投资既是当代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后果，也是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原因。发达国家以及中国近期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世界经济增速下降到1.5%，随后在2009年进一步下跌到-2.1%。若非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2009年年底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到较高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跌至更低的水平。201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短暂恢复到之前正常的4.1%，但是一直低于20世纪中叶后任何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期的水平：2011年为2.8%，2012年为2.3%，2013年为2.4%，2014年为2.5%，2015年为2.4%。

为应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开始了结构性变革。在中国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随后几年，发达国家采取了21世纪最为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高投资供应产业的需求出现暴跌，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中钢铁及其他产品的过剩。美国和欧洲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其政治后果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

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自2011年起，经济增长就一直保持这种状态：2012年和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降至7.7%，随后进一步地，2014年降至7.3%，2015年降至6.9%。

中国领导人将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称为“新常态”，并将其体现于国家规划中，这意味着会出现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自然而然地伴随着

国家支出中更低的投资份额。

中国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世界上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减速，但也存在自身的原因和特点。本书研究了中国经济变革中重要的结构性特点。这些特点将决定中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平稳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抑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Song et al., 2015)关注的是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存量增长推动的态势。改革以来的低生育率已经消除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的增长。这与人口老龄化的诸多后果一起，很久以前就已被预料到了。未预料到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下滑。这与平稳实施新经济增长模式所要求的恰恰相反。新经济增长模式所要求的投资率下降会使产出增长率大幅度下降，除非生产率同时出现大幅提升。目前并没有出现生产率提升的迹象。

过去一年广义的宏观经济形势并未出现大幅改变。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较大的实际困难。但是从2014年十分低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来看，本书的估计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问题。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预期下滑与生产率和劳动力并未出现适应性调整，消除了任一持续时期内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提升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

就标准的增长核算而言，按照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中国的调整涉及总增长速度的适度减缓。劳动力停止增长、资本存量增长大幅下跌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共同推动了这一增长速度的下滑。同时，中国必须实施一系列政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消极关系，以适度减缓总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1卷）：改革、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一书密切审视了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每一个要素。本书描述了人口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劳动力的增长、资本存量增长的推动因素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继而概述本书每一章的论述方法及主要内容，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从刘易斯到索洛：中国的人口转型

正如Lewis(1954)所分析的，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十年，中国的强势

增长使其成为世界上由剩余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榜样，Fei 和 Ranis (1964) 将这一分析应用到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Minami (1973) 将其应用到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在刘易斯式的劳动力盈余的经济体中，生产率很高并且初始规模很小的现代经济部门（通常为城市或工业产业），其经济增长为从农村地区涌入的劳动力所支撑（从农村涌入的流动人口保证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村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比动态发展的现代工业部门低得多，并且其边际生产力也更低。

以中国为例，1978 ~ 2006 年，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提高劳动力的供给价格。这是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以现行的工资增长率在现代工业部门工作，从而使工资固定不变。

现代经济部门中，工资增长比生产率增长更为缓慢。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增加，保证了高储蓄率。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增长的趋势保证了投资的高回报，鼓励了现代经济部门中储蓄增长所带来的投资。

人口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地区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现代经济活动中，大大推动了国家层面的生产率增长。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技术积累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现代经济部门的这种增长速度是农业部门达不到的。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数十年，以每个人的产出来衡量，中国的人口结构越来越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改革开放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得到了一条普遍的经验，即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上升，生育率一定会下降。儿童人数与劳动力的比率下降，使人口红利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资本存量和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然而，人口红利仅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短暂繁荣，最终低生育率会带来劳动力的低增长率乃至负增长率，加剧人口老龄化。

一国在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的时期，也伴随着抚养比率（年龄 14 岁及以下的人口与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总和与年龄在 15 ~ 59 岁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会比正常情况高。人口红利通过几个不同的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无论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会直接推动人均收入的增加。

21 世纪前 10 年的后半段，刘易斯式的剩余劳动力人口时期走到了尽头。在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中，过剩劳动力的尽头不是一个“转折点”，

而是一个“转折期”。整个国家出现工资增长速度普遍加快，但增速并不均衡。2004~2015年，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增长率是10.7%。面对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压力，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而降低，而越来越多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增加。广泛的经济影响体现为更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和下降的资本回报。中国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从2004年的24.1%下降到2013年的14.7%（Bai and Zhang, 2014）。

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型已经让位于新古典或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传统适龄劳动人口群体数量下降使总产出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泉；从农村地区到现代经济区域的人口流动增长的减速也令生产率失去了主要的增长源泉。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减缓削弱了其对投资的激励。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水平与劳动力技能的提高，而对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要求越来越高，这一点体现在对创新性和灵活复杂的资本、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依赖方面。

索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体中，供给方面的改革目的在于改善市场品质，允许向更加多产高效的经济活动调整，这是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Cai, 2016）。

从供给层面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破除充分利用劳动力供给的障碍相关。这一点可以降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损失。

从2012年起，适龄劳动人口（15~59岁）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据估计，15~59岁的人口中，经济活跃人口的数量从2018年起将呈负增长。因此，尽可能地找到充分利用可用劳动力供给的方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高生产率的领域。2015年，1%的劳动参与率与900万额外的经济活跃人口相对应。户籍（户籍登记）制度的改革促使城市更加充分地吸收农民工，为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创造了机会。

近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目前允许每个家庭可以养育两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有助于提高生育率，进而优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目前，每位妇女拥有孩子的平均数量约为1.5个，远低于2.1个人口更替水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人口出生率会逐步上升，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确保更高的生育率不会导致女性劳动力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有必要提升儿童护理水平以及增加面向公众的

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推广经济适用房可以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中国的人口政策正在向父母可以决定养育孩子数量的方向转变。如果中国遵循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生育率很可能会上升，但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Aoki (2012) 通过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历程的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索洛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国家经济潜在增长率至少在某段发展时期内存在紧密的关系。Manuelli 和 Seshadri (2014) 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甚至高于生产率的增长。近几年，中国在教育培训方面的开支大幅增加，这将有助于抵消劳动力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生产率变革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很多来源。在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尤其重要。近几年，中国的这一进程已经迅速减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 ~ 2010 年，由农村地区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长 4%，2014 年这一数据下降到 1.3%，2015 年仅为 0.3%。

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障碍导致城乡人口迁移增长缓慢。户籍制度阻碍了大量农民工成为城市永久居民，完全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利益。随着农民工比之前拥有更多的市场支配力，其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源泉，户籍制度的制度性阻碍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代价越来越大。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减小农民工向城市迁移数量增速的下滑幅度。在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助于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随着城乡迁移放缓，只有制度的不断完善才能保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久增长。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①。改革通过包括完善市场在内的制度变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②，可将其称为改革红利。

^① 我们将在 2017 年“中国经济前沿”丛书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 2 卷）》中论述人力资本、技术变革和创新驱动等问题。

^② 在近期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我们着重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和调整。例如，2010 年讨论了中国未来 20 年的改革与发展；2012 年涉及经济增长和发展新模式的问题；2014 年着眼于深化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获得改革红利的措施包括培育商品、资本、劳动力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自然资源市场，还包括对国有企业结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改革，以及对创新、金融和银行体制与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地方公共财政针对创业活动的鼓励政策的改革。当前政策的一个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几个产业中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僵尸企业”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与投资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政府已经在 2016 ~ 2020 年的“十三五”规划中承诺，保持经济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6.5%，并且在不依赖或极少依赖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存量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实现上述目标只能依靠改革和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实现。但是当下的问题是，无论是改革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加速增长，目前的效果都不明显。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只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高于经济供给能力增长率的水平。但这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会使政府人为地增加投资，因为这是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人为增加投资会阻碍市场和制度的改革，产生反作用，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措施。

那么，政府将如何解决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低于预期增长率的问题？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只能通过加快改革和承认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所宣称的目标。

公平与环境舒适度

在人口变迁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再平衡的任务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在同时满足更加公平和更低环境破坏程度的增长模式的条件下，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重新平衡并保持经济的增长非常复杂，但其并不与公平和环保的目标冲突。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满足劳动力增长、生产率提高以及实现公平的要求。高质量的教育覆盖农村与全部城市居民，可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促进公平。

宏观经济调整与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有关，这也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

不可避免的后果。这就要求依照政府的政策倾向进行经济再平衡，有力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集中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地区进行投资，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考虑区域政策，沿海省份拥有最佳区位优势，可以利用早期的机遇更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沿海省份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中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平均收入方面领先于内陆省份。如今，中国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迅速，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

长期存在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转型早期开始就得到缓解。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从2007年开始）早于其他地区，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自2000年起，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度持续增加，缩小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区域差距。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约从2012年起开始减速，拉低了整体的经济增长水平。然而，作为起步的地区，较之于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更大。

然而，中国在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没有考虑全球与中国国内的环境压力，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这在一段时间内与经济福利的不断增长是一致的，但超过某个临界点就会削弱生活水平提高的生态基础。2011年，国家领导人表示中国经济向“新常态”模式发展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越过了那个临界点，这是一种根本认识。打破经济产量增长与自然环境恶化之间的联系，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可以用人类福利的术语进行恰当定义。

中国政府在削弱经济增长与全球及地方环境恶化之间的联系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取得巨大进步的领域包括提升能源效率、减少并限制煤炭的使用以及在生产中减少资源密集度、抑制环境恶化严重地区的大气质量与水质的恶化、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排放的新能源，并且在一些地区试点实验“绿色增长”模式。要取得持续进展，就需要明智审慎地利用市场〔例如，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减少温室气体（GHGs）的排放〕和政府调节（例如，更严格地贯彻实施国家在资源勘探开发，空气、土壤和污染，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方面的管理规定）的双重机制。市场和政府调节的双重机制被广泛用于改变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仍然面临巨

大的环境挑战。

今年“中国经济前沿”丛书，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一主题，涵盖了引言所讨论的诸多问题。在此，我们给出本书后续各章的内容指南。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有11章，主要论述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可以将这部分内容概括为三个主题：“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型、金融市场绩效与改革。第二部分包括8章，内容涵盖资源、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第一部分：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

该主题下的四章内容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发展整体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审视了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在内的广义总量的变化。郜若素（第二章）更新了其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对近期经济发展的研究（Garnaut, 2015），着眼于中国政府最重视的发展目标。王小鲁和周伊晓（第四章）研究指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几种前景取决于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构建方式。伍晓鹰（第五章）分析了各经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总结了对预估增长绩效的意义。胡永泰（第七章）研究了公共财政与增长风险之间的联系，在消除改革开放早期的“软预算约束”的重要性方面得出有力结论。

郜若素（第二章）注意到，早期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Garnaut et al., 2013）将经济战略的根本性变革界定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如今所说的“新常态”。他观察到，在政府众多重要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目标中，仅有一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经济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变革是调整经济发展与国际、国内环境宜居度和稳定性压力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已经提前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将会尽己所能将全球变暖趋势控制在2015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的限制条件内。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在扩大内需、减少出口增长以及转变贸易顺差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贸易盈余在去年几乎回归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盈余水平。虽然在由投资拉动需求转向消费拉动需求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许进步，但是至今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方面取得

的进展极为有限。在扭转此前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的趋势方面仅取得了小幅进展。

王小鲁和周伊晓（第四章）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截至2011年实现强劲增长的源泉和此后的增速放缓以及在不同政策情形下的发展前景。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是21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放缓的几个原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对总增长的影响被宽松的货币政策所掩盖。因为这一政策推动更多的投资涌入，弥补了其他源头的低增长。这一举措最终适得其反，导致由投资驱动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钢铁和水泥产业产能过剩以及经济发展不景气。近期政策的持续推行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出现萧条，难以实现所宣称的经济增长目标。在这些情形下，2016~2020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可能会骤降至2.9%，2020~2030年可能达到4.4%。中国可能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非成功转变为高收入国家。中国应进行强有力地改革并构建体制机制，实现由依靠资源的发展向基于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快速发展的转变，同时停止实施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只会人为地保持高水平投资，并会阻碍消费。这样的改革会推动中国向发达国家过渡。如果能使以提高生产率为改革政策不受限制地进行，2016~2020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有望保持在6.2%左右，2020~2030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会更高。

在衡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面，伍晓鹰是一位研究功底扎实的学者。在本书第五章中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采用新的技术因素分析法，估算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按照政府决策发挥作用的大小，将中国所有行业分为8组。根据各行业的名义产出权重，伍晓鹰对历史上GDP的增速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在1980~2012年的整个改革时期，GDP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94%，这一数据低于官方所公布的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所做的贡献小于1个百分点，并且在主要由政府调控的行业中所做的贡献更小，如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在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中贡献1.63个百分点）。从世纪之交起，为对抗东亚金融危机，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关国有行业投资迅速扩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开始放缓。2008年之后，为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压力，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自此